

森林视角中的历史与文化的新解读

——第五届全国森林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孔艳, 李文军, 何晓琦

(北京林业大学期刊编辑部)

摘要: 2013年7月,由北京林业大学主办,国际木文化学会、亚洲绿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呼伦贝尔学院协办的第五届全国森林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成功召开。此次会议提交的报告从森林的视角,重新解读了历史与当代的森林文化,为森林文化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研究思路,充分体现了森林文化的4个基本特征,即生态性、民族性、地域性和人文性。无论是对于自然环境,还是对于历史文化,森林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森林文化是生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人类与森林长期相处形成和发展的文明现象。

关键词: 森林文化; 木文化; 生态保护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16(2014)-02-0009-06

New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Culture from the View of Forest: Review on the Fifth Session of Forest Culture Seminar

KONG Yan, LI Wen-jun, HE Xiao-qi

(Journal Publishing Depart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100083, P. R. China)

Abstract: The Fifth Session of Forest Culture Seminar was held in Hailar District of Hulunbeier City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in July 2013, with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IWCS (International Wood Culture Society), and AGA (Asia Green-Culture Association) being the co-organizers. The reports presented in the seminar interpret history and modern forest culture from the view of forest, provide broad research ideas for forest culture and huma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fully embody four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forest culture, i. e. ecological, national, regional and humanity characters. Forest has subtle influence on nature, history and culture. Forest culture is the core content of ecological culture, and it is a phenomenon of civilization formed in the long-term coexistence of human being and forest.

Key words: forest culture; wood culture; ecology protection

2013年7月14—18日,由北京林业大学主办,国际木文化学会、亚洲绿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呼伦贝尔学院协办的第五届全国森林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成功召开。来自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呼伦贝尔学院、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国际木文化学会、亚洲绿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等单位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就会议主题做了精

彩发言,内容涉及林业史、少数民族森林文化、森林与环境等问题。北京林业大学党委书记吴斌教授、校长宋维明教授对此次会议高度重视,并对会议的成功举办给予了大力支持。

自2005年以来,北京林业大学联合有关单位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4届森林文化学术研讨会,历届会议都对森林文化的理论、应用和历史,森林的可持续发展,森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担负的责任等问

收稿日期: 2014-03-15

基金项目: 国家林业局林业软科学研究项目“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森林文化应用与发展研究”(2013-R05)。

第一作者: 孔艳, 硕士, 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 编辑学、森林文化。Email: kongyan@bjfu.edu.cn 地址: 100083 北京林业大学期刊编辑部。

题进行探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本次会议从森林的视角重新解读了历史与当代的森林文化,为森林文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路和新方向。从生态的角度解读文化,从文化的角度审视生态,拓展了认识中国历史的空间。无论是对于自然环境,还是对于历史文化,森林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也是难以替代的。森林文化是生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人类与森林长期相处形成和发展的文明现象。“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是森林文化的最高境界。本次会议的研讨内容充分体现了森林文化的4个基本特征,即生态性、民族性、地域性和人文性。

一、森林文化的生态性

森林文化的生态性是森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从目前全球性生态危机看,森林的破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森林文化无论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都将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保障和支持。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金久宁高级工程师介绍了民国时期(1912—1949)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林学研究学术成就。民国时期是中国科学技术吸纳西方科学思潮并逐步走向现代的关键时期。随着西方科学思潮的传入,留学欧美、学成归国的植物学者带来了西方学术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国立中央研究院集聚了一些青年才俊,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为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国家层面现代意义上的植物学研究起步于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是植物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其前身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于1929年在南京成立,分动、植物两组。这是我国最早由政府设立的生物研究机构。在成立初期,研究所出版刊物 *Sinensia*, 一年4期,报道全所包括动植物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当时的国内是别具特色,而且是开创性的。1947年8月,植物所共有高等植物分类学研究室、真菌学研究室、森林学研究室等8个部门。林学研究基于植物分类学、真菌学、形态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等多学科的配合和相互渗透,亦开展得甚为活跃。自1947年起,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定期发刊 *Botanical Bulletin of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植物学汇报》),一年一卷,每卷4期。发表的涉及林学的研究论文内容是相当宽泛的,既有高等植物分类学方面的,也有植物形态、植物生理、细胞遗传学方面的,更有森林学方面的。从发表的论文数来看,森林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占有相当比例,内容涉及森林学研究的各个层面,足见森林学研究是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内研究工作开展较为活

跃的领域。金久宁介绍了我国近代林学研究的开拓者——邓叔群的事迹。邓叔群率先提出了生态平衡的观点,并在黄土高原地区进行了科学经营林业和科学管理森林的实践,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科学经营管理森林的成功范例——洮河林场,并对林场中的森林进行调查、勘测,绘制了我国较早应用的林型图,并就各树种、树龄,以及林木生长、材积、更新和病虫害等情况进行分类研究,制定出一整套保证更新量、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科学经营管理制度,使森林长存、采伐不绝。邓叔群提出林学教育及教材应包括:森林生态学、造林学、测林学、森林经营学、森林病理学等,为此后我国林学事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呼伦贝尔学院张慧平教授借鉴日本森林文化建设经验,针对当下我国森林文化面临的宏观环境,提出了3个森林文化与森林发展的相关问题,引人思考:林业与文化的关系、林业工程与文化的关系、林业生态文化建设的方案。日本人一直保持着对森林的亲近和敬畏,日本森林文化不仅影响着日本人的精神,并且已经融入到环境保护、环境教育、山村城市建设、区域经济振兴与流域管理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我国目前宏观的林业生态文化建设在目标、对象、手段、效果预期等方面都没有明确的界定。例如,2007年江西省林业厅成立了生态文化建设中心,但国家林业局却没有设立专门机构,相关职能仅设在宣传中心。张慧平建议管理者应首先明确目的,进行宏观、全面的思考,制订森林文化建设方案,统筹规划,使执行者有据可依。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毕季菡介绍了辽金元时期生态的保护措施。辽圣宗曾诏令:“军中无故不得纵马,及纵诸军残南境农桑。”禁止滥砍滥伐,保护果树林木。正隆五年(1160),金海陵王曾诏令“禁中都、河北、山东、河南、河东、京兆军民网捕禽兽及畜养群雕隼者。”禁止在特定区域捕猎动物,禁止捕杀特定种类动物,禁止特定时间捕猎动物。鼓励农桑发展,提倡植树造林。统和十五年(997),辽太宗“诏诸道劝民种树”。至元七年(1270),立司农司,颁农桑之制十四条:“种植之制,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这些措施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生态保护意识,在施政时兼顾了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设置了专门的生态管理机构,并不断完善其功能。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肖文副教授介绍了他所在学院建设生态文明校园的情况。该学院是江西省唯一以林业为基础、生态环境为特色的林业类全日

制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学院以“和为生、行为态”为指导思想,以自然生态为物质载体,以管理生态为制度保障,以人文生态为核心内容,以服务生态为终极目标。和为生,即营造“和气、合力、和谐、天人合一”的校园风尚,实现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行为态,即倡导“行言、行知、行德、知行合一”的师生精神,践行言行一致、知行一致、德行一致的工作和人生态度,实现行为、思想、精神层次的高度和谐统一。在自然生态建设方面,整个校园已形成集教学、科研、观赏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树木园,校园环境优美,草木葱茏,绿树成荫,风景秀丽,植被覆盖率达70%。在生态建设管理方面,2011年9月,学院被国家林业局、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国生态文化协会授予“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称号。推进低碳校园建设,优化学院生态管理、行政管理、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建立了绿色办公制度,包括无纸化办公、中水回用处理中心、办公用电节能模式、生态化停车场、“人车分流”步行进入核心区、汽车尾气和噪音“零排放”等。在人文生态建设方面,学院人文生态景观优美,观赏、科研、文化价值高。建有集研究、考察、教育等功能为一体的生态科技馆、生态文化展馆。设置了生态教育宣传设施,大力开展生态文明观、生态科普、生态道德、生态法制、生态审美等多方面的教育活动。

二、森林文化的民族性

森林文化的民族性指不同民族在认识和利用森林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同森林背景和不同文化品位。诸多的少数民族,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山地森林环境,其宗教、风俗、习惯、情趣,以及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呈现出个别性和差异性,也造成了森林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张慧平教授代为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研究会理事龚宇的研究成果。龚宇根据多年从事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研究经验,比较了中俄鄂温克族的森林文化。鄂温克族是跨越中国、俄罗斯居住的跨界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中国也是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16世纪鄂温克猎民的祖先居住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由于历史上的不断迁徙和居住分散,加之交通不便,互相来往少,处于隔绝状态,逐渐形成区域间的经济和生活的差异。俄罗斯境内的埃文基族就是鄂温克族人的后裔,主要分布在西伯利亚地区。根据我国2000年人口统计,鄂温克族共有30505人,其中有26201人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约占全国鄂温克族人口的87%,他们主要居住在东北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与

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中国境内的鄂温克人主要分为以下几个聚居区:在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族主要从事畜牧业;黑龙江省讷河市的鄂温克族从事农业;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阿荣旗、扎兰屯市等地的鄂温克族则以半农半猎为生;而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鄂温克族从事着传统的狩猎业(1999年全部下山定居),因为鄂温克族在狩猎时使用驯鹿,常被称为“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简称使鹿部鄂温克)。

内蒙古扎兰屯市工商局退休干部“草根学者”董联声从1975年开始研究鄂温克民族历史,至今已有30多年。在本次会议上,他介绍了本人研究的四大成果。①使鹿部鄂温克族人口研究。这支鄂温克族人历史上一直从事狩猎生产,被清政府称为“使鹿部”,近代被称为“最后的狩猎部落”,几乎与世隔绝。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们才跨越数个历史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至1999年全部下山定居。使鹿部鄂温克族人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是我国唯一的以使用驯鹿和狩猎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聚居群体,在根河地区生活了300多年。从1965年正式定居后,政府建立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共有35户136人。目前使鹿部鄂温克族总人口为120~130人。董联声从家庭组成、生育状况、出生率、死亡率等方面分析了使鹿部鄂温克民族人口徘徊不前、缓慢发展的7个原因,并于2009年发表了敖鲁古雅使鹿部鄂温克族民族历史研究专著《“使鹿部”——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一书。②撰写了使鹿部鄂温克族人的四大氏族近代族谱,填补了中国在鄂温克族历史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董联声依靠20~30年前尚在的鄂温克老猎民,获取了大批珍贵的民族人口口碑资料。由于当年采访的鄂温克老猎民已经先后离世,再进行挖掘调查已不可能。因此,这批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十分珍贵的民族历史资料永存于世。该族谱用图表形式反映了200多年来居住在大兴安岭西北麓密林深处的鄂温克族人的氏族关系、血缘关系、辈分关系、“乌力楞”(家庭)关系、性别、年龄、姓名、出生和死亡时间等内容。追溯时间大体始于19世纪初期,止于2008年7月,一般可追溯到5~6辈(代),最久远可追溯到9辈(代)。这支鄂温克人近代共有四大氏族,分别是索罗共、卡尔他昆、固德林和布利托天。目前唯一在世的四大氏族后人90多岁的女猎人玛利亚·索。③用汉语翻译了大兴安岭西北麓原始部落里的使鹿部鄂温克语所有地名,共300多个,逐一进行了现场核对。这

些地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与狩猎、地域、民族交往有关。例如,满归镇地处大兴安岭北部西坡,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根河市。传说120年前,俄罗斯猎民进入狩猎区后,在河边发现1个赤身露体的渔民在晒太阳。回程路过乌力楞把这件事讲给当地人听,并将该地称为满归,汉语翻译为“蒙古人在河边洗澡”,满归镇由此得名。^④在研究鄂温克民族历史的同时,搜集整理了东北方言,并于2013年发表了专著《中国·东北方言》,为中国首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加注了汉语拼音标注、进行了详细注释和例句解释、汇集了诸多东北地区歇后语、集萃了东北特色魅力的语言文献。全书84万字,共收集、载入100300多条东北方言。

三、森林文化的地域性

森林文化的地域性体现了各地域的地理和气候特征,也与当地的历史文化特点紧密相关。

国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王希群教授高级工程师强调了延安精神,并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林业发展史。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坚定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的精髓和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陕甘宁边区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域,位于我国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境内山丘起伏,沟壑纵横,土质疏松,森林面积稀少,水土流失严重。为了战胜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大量的垦荒与森林资源的消耗不仅使边区度过了最困难、最艰苦的岁月,也为国家、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另一个侧面看,所垦荒地主要是森林、草原,森林资源的减少,带来了水土流失的危害。根据1940年乐天宇等人所著的《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和1957年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的《陕甘宁盆地植物志》,全边区森林面积1万km²,1941年境内有植物6类204种。保护好原有森林、大规模地开展植树造林,是从根本上改变边区自然环境、保障农牧业生产的需要,也是建设革命根据地、改善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建设事业。边区植树造林,主要是依靠群众开展全民性的绿化活动。据边区建设厅不完全统计,1943—1946年,在陕北张家畔荒滩植树500余万株。1941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加强林业生产工作,成立了边区林务局,通过《解放日报》和编写小册子宣传森林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启发广大群众,增强爱护森林和树木的思想,并编制或印发了短小精悍、针对性强的材料,如《延安植树速效方法》等。1945年陕甘宁边区政府

在延安建立了枣园、桃园两个小型森林公园。在20世纪上半叶,陕甘宁边区“南泥湾垦殖”和云南“开蒙垦殖”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最有成效的垦殖实践。但在战争时期,边区政府的林业政策和法令的实际效果是有限的。

华南农业大学森林经理研究室陈世清教授介绍了香港郊野公园科普教育的发展概况、主要形式及其对内地自然公园科普宣教系统建设的启示。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急剧的市区发展对天然景观、动植物造成了重要威胁,为保存生态、保护景观和提供康乐场地和教育设施,政府于1976年制定《郊野公园条例》,划定郊野公园,主要用于康乐、自然保育及教育。渔农自然护理署于2000年起加强宣传及教育,以配合郊野公园转型为供市民探索大自然的场所,完善科普教育体系建设,如出版大量有关香港生态的书籍,又把郊野公园内的黑白资料牌换成彩色,以及更新郊野公园游客中心的资料等。香港郊野公园科普教育主要形式有游客中心、科普教育径(按功能分为3种:自然教育径、树木研习径、远足研习径)。香港郊野公园的环境教育还强调针对不同人群按照不同主题开展环境教育活动。每年度均制定详细的环境教育活动计划,通过主题活动、主题参观线路、主题讲座、主题实践活动、主题游戏及竞赛等形式,向公众传递不同的环境保护和生态知识。并利用其他教育传播媒介,如网络、书籍、宣传资料等向公众传达科普知识。对内地自然公园科普宣教体系建设的几点启示是:重视科普教育设施和内容的系统性规划与管理;重视软件建设和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注重“因地制宜”的环境资源开发;重视环境解说人员的素质和长期培养。

亚洲绿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和爱军博士介绍了本人与日本学者高桥勇一、山田聪子、长滨直等人在中国北部科尔沁沙漠及沙漠化地域的研究成果,藉此谈到了有关自然保护、植树、环境教育、环境规划、学术文化交流等活动。科尔沁是蒙古族地域文化——科尔沁文化的发祥地,历史上科尔沁草原是成吉思汗之弟哈斯尔的领地,总面积5.17万km²,位于辽河以西。从公元前4000年至今,科尔沁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山戎族、东胡族、鲜卑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和汉族的人民,从最初农业和畜牧业的兼营,到游牧中心再到农耕和牧业兼营,在历史的沧桑演变中,沙漠也在逐步侵蚀着科尔沁的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当地人口增长较快。20世纪80年代后,家畜增加较多,尤其是山羊,过度的采伐、放牧和垦殖造成科尔沁地区沙漠化非常严重。1999年日本学者在当地

群众中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与研究者的观点存在一定出入。在导致沙漠化原因调查中,研究者认为过度的农地(土地)开垦占45%,当地群众认为占33.4%;过度放牧,学者认为占29%,群众认为占46.5%;森林砍伐,学者认为占20%,群众认为占16.2%;其他原因,学者认为是道路和工矿业的开发,群众认为是体制机制原因。日本学者从1996年至今在当地乌旦他拉村进行了环境教育林事业,目标是在生态、经济、社会3个层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层面效益的调查中,53.3%的当地人认为环境教育林事业是很好的,如果没有环境教育林事业,那么每年沙漠扩大机率将以2%的速度增加。日本学者提出“木林森文化”要有机统一,森林文化更长远,更要持续、科学发展,“木文化”“林文化”“森文化”三者之间相互转化,共同推进森林文化体系建设。最后,和博士提出几点建议:①建立全国性的森林文化研究会和省市级分会或小组;②通过多种具体实践活动全面开展森林文化教育;③国务院相关部门、国家林业局、林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森林文化政策研究,为中央决策者提供参考;④林业高校设置森林文化专业,重视并开展教育实践活动;⑤国家林业局、人民日报社、绿色时报社、党校联合建立基地;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四、森林文化的人文性

森林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如何利用森林的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更好地保护森林,实现森林的可持续利用是当代森林文化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从森林的视角重新解读历史文学作品和专著,也为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南京林业大学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李明阳教授分析了从森林物质产品到森林文化产品转化的要件和途径。我国具有典型的森林文化产品。如江苏南京的梅文化。早在公元前春秋时代(前770—前476),在吴王夫差铸剑的冶城(今朝天宫)就曾有梅花种植。南京地区的梅品种资源极其丰富,不乏很多珍贵品种,如别角晚水、南京红、寒红等。溧水傅家边梅园已成为南京地区最大梅园。又如,浙江安吉的竹文化。安吉县有悠久的竹子生产历史。安吉有竹林面积67 000 hm²,立竹量1.35亿株,年供应商品竹2 000万支,竹制品加工企业2 000多家,年产值突破65亿元,居全国“十大竹乡”之首。安吉竹种园、竹子博物馆、中国大竹海构成安吉三大竹文化旅游风景区。再如,福建武夷山的茶文化。武夷岩茶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最早被人称颂可追溯到南朝时期(479—502),而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之于唐朝

孙樵(约825—约885)写的《送茶与焦刑部书》。古人留下了很多茶文化遗迹和古建筑,如御茶园、宋代遇林亭窑址、水帘洞茶馆,以及被镌刻在武夷丹崖之上的摩崖石刻。武夷岩茶由于秉山川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大自然赋予其俭朴、清纯、和静的禀性,深得儒、释、道三教的喜爱,茶成为三教的精神寄托和理想的物质基础。此外,武夷山茶文化还融朱熹理学文化、闽越文化、悬棺文化、红色文化和当地的民俗文化等多种文化于一体,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分析这些成功的森林文化产品,得出森林物质产品要转化为文化产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本土性与特异性,悠久的栽培历史,产品化、系列化,符合时代需求——保健、养生、精神,而且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如打造节庆活动、广告宣传、建设基础设施、扶持文化企业。转化的途经包括庭院经济(改革开放前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种植),大规模种植(改革开放后,公司+企业、公司+农户模式),挖掘文化,塑造品牌(如金骏眉、银骏眉、别角晚水),形成文化品牌、打造文化景点。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罗桂环研究员以博物学为研究视角,诠释了《红楼梦》中观赏植物的文化内涵。曹雪芹不但有深厚的文史功底、敏锐的社会洞察力,还有相当丰富的花草虫鱼知识。他充分利用了传统的文化积淀,使其艺术创作独具特色。古人的比德审美观,李白的名花倾国,唐宋间学者对荷花、梅花的称颂,都给曹雪芹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曹雪芹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文人。他的小说有明显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情趣,他知晓不少动植物,乃至它们的一些习性,但更注重其内涵的文化积淀。因而在运用众多的花草鸟虫来象征和烘托其中的妙龄少女的命运和境遇时,含蓄有韵。曹雪芹审美的着眼点是园林。作为在深宅大院成长起来的人物,作者无从感受大自然辽阔苍凉、博大风姿的壮丽之美,但对桃红柳绿、莺啼花谷的庭园秀美,亦即其所谓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风庭月榭,帘杏溪桃”却异常熟悉,故而通过朦胧的梦来实现在多彩多姿的大观园里神游。大观园被作者择为抒发幽情的主线和放飞理想的场所。《红楼梦》书中涉及的花木众多,不但有传统的名花,如兰花、牡丹、芍药、桂花、竹子、梅花、荷花、菊花、海棠、蔷薇,也有新传入的缠枝莲等花卉。作者颇费心思地用花卉来象征那些聪慧的女孩及她们的命运,同时通过大观园中的景观进一步阐释其人生的际遇,如怡红快绿的奥妙、花气袭人知春暖、潇湘馆幽情、秀外虚心数竹荷、蘅芜苑芬芳等。而从他用植物“拟人”的叙事手法中,我们对书中的人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这或许是古代博物学“多识草木鸟兽虫鱼之名”的一种功用,也是传统植物文化的一种特点。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魏露苓教授考证了中国传统菊谱中的“洋菊”。菊谱记录了中国历代各色菊花品种和栽培技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菊花专书。在中国所有诸如兰谱、牡丹谱、梅谱、月季谱、凤仙谱等花卉专书中,菊谱的数量是第一位的。魏露苓对中国传统菊谱中的洋种进行专门的探讨,分析了邹一桂“冒以洋名,实出中国”之说。最早记录外来品种的菊谱是宋代范成大的《菊谱》。明清两代是中国传统菊谱大量出现的时期,和洋种有关的菊谱皆成书于清代。其中,邹一桂的《洋菊谱》专门记录“洋种”,所载36种菊花中有土种和外来品种,也是中国传统菊谱中唯一专门记录洋种的菊谱。除此之外,比较重视洋菊的便数清代作家许兆熊的《东篱中正》及程岱葑的《西吴鞠略》。洋菊在清代引入之后,因其风格与土种不同,容易受到世人欣赏。人们以种植洋菊为乐趣,崇尚雅致的乾隆皇帝亦然。在这种背景下,完全有可能有人为博圣颜而在土种菊中选择别致、漂亮的当成洋菊进贡,或内廷花匠们误将土菊认为洋菊。所以,《洋菊谱》所载的36种洋菊并非全为洋菊,而是既有洋菊,也有土菊,其中一部分乃是当时培育出的新品种,却被当作洋菊。《洋菊谱》序言中“冒以洋名,实出中国”之说,只是部分正确,原因是清代难以禁绝的对外贸易、崇洋媚外之风俗、心理层面之自大与贬他导致。

北京林业大学赵广杰教授介绍了国际木文化学会自成立至今的重大事件。2007年7月,国际木文化学会(International Wood Culture Society,简称IWCS)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式成立,是由世界各地木材相关领域的热心人士,以研究、学习和推广木文化为目的组成的非营利组织。同年11月,在国际林业研究组织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restry Research Organization,简称IUFRO)成立木文化研究小组。由Howard Rosen(美国)任组长。2008年3月,由国际木文化学会主办,北京林业大学和木材实验室网承办的“第一届非物质木文化研讨会”在北京林业大学召开。2009年至今,在世界各地相继举

办了多次世界学者参与的学术会议和木文化推广活动、全国各地系列主题调研活动及日本京都木文化相关调研活动。2013年,在非洲召开了木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世界36个国家的106名代表参加了学术研讨。会议主题是“Wood in Africa: Cultur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Utilization, and Future Sustainability”,并开展了24个非洲国家参加的非洲木雕竞赛。赵教授以视频形式介绍了现场精彩的木雕原料、木雕场面,以及木雕工匠讲解创作意境与表现技法。与会代表在沙丘疏林地共植树1000余株,含6种热带雨林树种。在非洲会议上,国际木文化学会执行长侯文彬先生提出了“世界木材日”(World Wood Day,简称WWD,为每年的3月21日),WWD的宗旨是 advocat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event, towards a sustainable future with wood。每年3月21日前后是春分,是万物萌生之日,也正是树木开始一年生长之时,寓意着生机勃勃、可持续性。2013年3月21日,世界木材日庆典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市Karimjee议会厅广场隆重举行。坦桑尼亚资源与旅游部长Lazaro Nyalandu先生、国际木文化学会副会长Howard Rosen、IUFRO代表Andrew Wong先后致辞。

浙江师范大学林雁教授也做了精彩发言。

五、结 语

在本届森林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学者,针对森林文化涉及的各种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思维碰撞,为森林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广泛的研究思路和新的方向。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森林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兼顾并提升森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倡导生态,以文化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森林文化不仅需要继承传统历史文化,更需要与当代森林产业有机结合,提升森林产业的竞争力,创新森林文化产品并普惠社会,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林业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 何晓琦)